在出仕的矛盾中出世

入仕，象征高高在上的权势地位，享用不竭的荣华富贵；出世，象征一文不名的家徒四壁，风餐露宿的清贫生活。在这个利欲为先，人心浮躁的社会，大多数人追求名利，把金钱权力视为人生中必须得到的终极目标。当然，这样的人无独有偶。现代的人尚且如此，古代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多少人为了令人羡艳的荣位金山争得头破血流，斗得你死我活，然而……

有的人宁愿穿着粗布麻衣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也不要穿富丽堂皇的衣服吃着珍馐玉食过着奢靡华丽的生活。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尤为盛行，有许多向往田园生活的文人骚客选择饮清露食野果品美酒隐居在乡野园林中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其中，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靖节先生----陶渊明最为著名。“世外桃源”这个神圣的词语莫不为后世文人志士所引用以及所憧憬。没错，五柳先生陶渊明开垦出这一块圣洁的乐土，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楷模和艺术典范。殊不知，在这看似隐逸安然的田园生活中的背后又夹杂着多少辛酸和挣扎。清代王夫之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即人有私欲是理所当然顺应天理不可避免的事。每个人都不是没有欲望的圣人，就连我们最为人称颂的师尊孔子都几度越国追求为官之道，不过是不得志转而追寻治学之道罢了。陶渊明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他的内心也有过无数的挣扎。

提起陶渊明的仕宦生活就不得不说到他的生活状况了。由于陶渊明的父亲早逝，所以，在陶渊明的童年时期，家道已经开始中落，生活开始走下坡路了。即使家道中落，但毕竟是官场世家，接受教育的能力还是有的。陶渊明兴趣爱好主要有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爱好读书，喜欢抚琴，喜爱山水。还有一个不能称之为兴趣的癖好那就是他非常喜欢饮酒。他曾说“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酒痴”。这些兴趣爱好都可以作为他喜欢隐居的重要依据。

陶渊明接受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教育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简而言之，儒家教育事实上是为出仕为追求功名利禄所做的奠基。早年的陶渊明也非常希望功成名就，他曾谈过他的抱负：“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魏晋社会是一个有门阀制度的黑暗社会，政治上的前途主要取决于门第的高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讲的就是这种严酷的残酷现实，因此，不管陶渊明怎么努力，他早年的抱负都是无法实现的。

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形容他第一次出仕之前家中境况是：“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因此，他不得不出仕第一个官职-----江州祭酒。这一官职掌管一州内的兵戎、治安、田租、户口、祭祀、农桑等各个部门，实物很杂，而且经常没有实权，并且，东晋士族流行的风气是高门弟子不愿意负责具体事务，陶渊明喜欢清闲事务，不太能够忍受繁琐的官场杂务，因此不久就辞官了。陶渊明后来又拒绝了主簿一职，居住在柴桑的上京闲居。这所住宅的特点是有东轩，轩外有东园，园内有孤松，有菊花，明垂青之后，就成了“花之隐逸者也”。陶渊明在《和郭主簿》中讲：“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花正是体现了他对幽静隐逸生活的向往。采菊东篱下的他以田园诗人和隐逸者的姿态，赋予菊花独特的超凡独特的隐者风范，菊花从此便有了隐者的灵性。

陶渊明家中一贫如洗，不得已在孙恩叛乱的那一年出仕担任了恒玄的幕僚。陶渊明赴京都返回江陵复命的时候，顺便省亲，但因在规林遇到大风，船只不能前行，他非常焦急，为此他写了两首诗。面对着震天的巨浪和不息的狂风，长期奔波在外的他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第二年他休假回家时又作了一首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这几首行役诗从中流露出对离乡为官的后悔、倦怠之意以及对归田躬耕的强烈愿望。这一年的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了。他要守丧三年，这恰好让他避免卷入一场灾难。

桓玄之乱后，陶渊明再次出仕担任刘裕的参军，但这并非自愿，他在赴任途中作诗：“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无不说明他已经开始厌倦漫长的旅途和不自由的官场，所以，一边赴任，一边做着弃官归隐的打算。但他并没有立即弃官。后来陶渊明为离家方便就改任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但是不久刘敬宣在江州的幕府解散了。这正好让陶渊明顺应退隐田园的愿望解甲归田了。

陶渊明主要出仕的原因便是家庭入不敷出经济困难。陶渊明屋子里空空荡荡，寒气直逼体内，甚至把箪瓢作为屋内的摆设，除此家中一片萧瑟，别无他物。他曾对亲朋好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弦歌"指代地方官，而"三径"指代隐居生活。他想找一个县令一样的官职，挣点钱，为以后的隐居生活作准备。不久，他获得了彭泽县令这一职位，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最初，他对此职位相当满意，他可以获得百亩良田，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只做了80多天，便毅然辞官归田，自此以后，一生中再也没有出仕。而陶渊明出世的原因，几乎众所周知，陶渊明不喜约束管教在接待上方官员时感慨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决然辞官。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轶闻之一。但是陶渊明后来作诗时并没有提到辞官的这个原因。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这里面，他讲述了他为官的理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以及他辞官的理由："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陶渊明本人再三强调他强烈和易与人产生矛盾的性格不适于为官。他本来打算干上一年，但是以"武昌奔丧"为借口恰好辞官了。

无论陶渊明辞官的真实原因究竟如何，但这个决定无疑使陶渊明得到了解脱，他如同脱缰的骏马驰骋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享受着自由的乐趣。陶渊明辞官后并没有居住在柴桑，而住在他的老宅----园田居。他的老宅地处南野，坐落在穷巷之中，有八九间草屋，树木环屋，葱葱郁郁，且有水塘。这里完全符合隐居之人居住的环境。回到老家，这也就完全意味着他已经下决心彻底脱离官场了。但这并不代表朝廷就不会征召他为官，面对这种诱惑他也不为所动。实际上，朝廷征辟他的原因正是因为他高尚的人格和不为人下的气节，倘若他三心二意，不能从一而终，朝廷也会因此看不起他，不会真正给他实权重用他。

但是，陶渊明隐居最主要的压力并不是来自社会舆论。他隐居受到了他的族叔陶淡、他的舅叔公孟陋等亲朋好友的影响。陶渊明最主要的压力即动力是来自于生活的贫困和亲朋好友出于好意的关心。他的压力概括起来有几点：首先是生活贫困，只有出仕为官才能保证家人的衣食无忧，人到了饥饿甚至死亡的时候就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的第一重考验。其次，魏晋时期极为重视孝悌之义，陶渊明作为一家之主，他必须通过家庭责任感所带来的考验，他必须赡养老人抚育儿女，这是他的责任亦是他的义务。在母亲去世后，他才觉得肩上的担子略有减轻。隐居之后他一直对儿女有所愧疚。最后，他有许多朋友关心他而且官府的诱惑。但是他还是选择隐居。这种支撑他的力量来自儒家"忧道不忧贫"的教诲与"君子固穷"的古训和前圣先贤们安贫守贱的事迹使他在穷困潦倒中依然坚持自我不向世俗屈服。

陶渊明的人生实践构成了后世士大夫一直追求的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陶渊明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文学方面。现代社会中我们或许真应该捧一卷古书，饮一杯香茗，眺望远方自然的美景，洗涤出纯净的心灵。即使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也要在心中架构一方净土。